

林华生 著
曾刚 译
胡坚 审校

日本 在亚洲的 作用

本书考察了日本与亚洲，特别是东盟国家和新兴工业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日本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参与程度，包括投资、发展援助、贸易摩擦、非关税壁垒等内容。

北京大学出版社

日本在亚洲的作用

林华生 著
曾 刚 译
胡 坚 审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在亚洲的作用/林华生著;曾刚译;胡坚审校.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

ISBN 7-301-01117-2

I. 日… I. ①林… ②曾… ③胡… II. 日本作用-东盟-亚洲 IV. F022

书 名: 日本在亚洲的作用

著作责任者: 林华生著 曾刚译 胡坚审校

责任编辑: 符 丹

标准书号: ISBN 7-301-01117-2/F·09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www.pup.com.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27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8.5 印张 240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第一章 日本对马来西亚“向东看”政策的观点

1981年12月马来西亚总理拿督斯里·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公开宣布了“向东看”政策。这个政策轰动一时,并成为马来西亚一项重要的国家政策。然而,它在马来西亚和日本的政策制定中却引起了一些误解、争论和混乱。该政策旨在引入日本的工作伦理和管理体系,以促进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率。例如,有人认为“向东看”政策将马来西亚以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化与日本的科技和资本结合起来,将最终成为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也有些观点认为整个政策并不实际,因为马来西亚是个多民族国家,而日本是个单一民族国家。他们进一步指出这两个国家的文化、社会价值和历史背景是完全不同的,这将成为马来西亚实施“向东看”政策的严重障碍。

本章将分析日本政府、商业界、学术界以及大众媒体对这一政策的看法。

政府与外交

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立以后,日本对东盟国家一直都很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它在这一地区投资和贸易的大量增加造成的。东盟对日本的批评也随之出现,因为东盟国家担心日本会从经济上控制它们。日本的军国主义出现复活的趋势后,这种忧虑就更严重了。1972年7月,在与福田赳夫进行一场决定性的角逐以后,田中角荣接手了第三佐藤内阁。田中知道他的前任佐藤荣作在东盟国家中形成一种“强硬派的形象”,他决定改善日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

然而,他的好意并不为东盟国家所接受,他1974年1月出访该地区时,那里正举行反日运动。他也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发展日本与东盟的友好关系中去,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很快被卷入“洛克希德丑闻”中,另一部分也是因为他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使自己的派别成为日本自民党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由于这些国内事务他不可能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马来西亚和东盟地区。

1974年12月,出现了以三木武夫为领导的折衷内阁,他借助田中的老对手福田赳夫的力量解散了田中内阁。然而,三木武夫甚至没有机会出访东盟国家,因为在两年的首相任职期间,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国内机构改革和“田中洛克希德丑闻”事件中,他是热衷日本国内事务的改革者,对东盟的事务并不是很关心。

1976年12月在日本自民党的一场激烈的权利纷争之后,三木武夫被福田赳夫所代替。在比他预期要短的两年首相任期中,他于1977年8月出访了东盟国家。在这次出访的最后,他在菲律宾提出了他的“心心相印学说”(也被称为福田赳夫学说)。他的“心心相印学说”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东盟对日本经济统治该地区的反感。然而,在1978年12月,他的连任希望却被大平正芳所打破。大平参加了1979年5月在菲律宾举行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然而直到1980年6月他去世,他一直都没有出访东盟国家。1980年7月铃木善幸领导的折衷内阁取代了大平正芳政府。铃木1981年1月对东盟国家的访问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因为他是第一位在对美国进行友好访问之前就出访东盟国家的日本首相。然而,他这一特殊的决定并没有引起东盟国家的广泛回应。他也很少评论东盟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缄默的性格造成的。他对在任期间所堆积的许多国外和国内问题并没有提出雄心勃勃的解决方案。人们原来认为他可以连任首相,因为他受到“田中曾根”派的大力支持,但是到1982年11月,他还是被中曾根康弘所代替。中曾根康弘破例地给美国总统里根和东盟国家领导人通电话,表达他改善与美国和东盟国家关系的强烈决心。1983年4—5月间中曾根康弘访问了东盟国家和文莱。1983年5月9日他在马来西亚结束了这次出访,正如许多观察者所预料,这也是因为马来西亚正式公布了“向东看”政策。

在过去的十年中,日本的六任首相,从田中到中曾根康弘,除了三木和大平以外,其他四任首相都访问了东盟国家。他们都对改善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政治和谐和文化交流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们同样也强调改善同该地区双边和多边的关系。然而,除了福田和中曾根康弘以外,其他的领导人在当政期间并没有对马来西亚的“向东看”政策发表什么看法。日本政府故意对马来西亚“向东看”政策采取冷淡的态度。他们总是避免显得对它过于热情,尽管他们对马来西亚“向东看”政策还是表示欢迎的。众所周知,二战以后日本在自民党的管理下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日本政府也很欢迎各种对经济奇迹的认同的观点。

福田认为:

“向东看”政策对日本和东盟关系的影响很值得重视……

日本以历史和传统的社会体制、工作伦理为基础,自愿和积极地引进西方的技术和知识。虽然日本人民的生活方式随着新技术的引入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日本传统的社会体制和工作伦理却一直完好无损地保留到现在。

我非常高兴日本可以和马来西亚在国家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方面进行合作。不过,我认为同时马来西亚应该自己判断他们应该从日本引进哪些经验,日本决不会干涉这些事……我很高兴看到日本能以这一方式帮助马来西亚制订一项重要的国家政策。考虑到这一政策的时代重要性,我们应该耐心等待长期的成功效益,而不应该只看短期的结果。由于“向东看”政策将对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我衷心地希望它能够获得成功和发展。^[1]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福田将“向东看”政策视为马来西亚的一项重要国家政策,在日本—东盟关系的发展中应该给与认真的关注。他强调日本愿意帮助马来西亚进行国家建设,而将主动权和决策的主动性留给了东道国。

很显然日本的政界对“向东看”政策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或者至少从原则上来说是这样的。当时,马来西亚并没有向日本提供具体的方案和实现这一政策的清晰蓝图。日本方面同样也没有对这一政

策提出什么具体的方案,尽管铃木政府并没有否认马来西亚同日本贸易关系以及日本在该国投资的重要性。然而,从外部环境来看,日本和美国、欧盟(EC)之间存在经济和贸易摩擦,从国内形势来看,日本当时正在经历着经济停滞与金融危机。因此,铃木无法对“向东看”政策给予积极的反响,也无法从资金或物力方面向马来西亚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马哈蒂尔政府本想会晤日本政府,然而这一计划却因为铃木 1982 年 10 月从自民党中辞职而推迟。

在中曾根康弘政府成立两个月后,马哈蒂尔博士访问日本。在马哈蒂尔邀请日本积极参与“向东看”政策时,中曾根康弘在 1983 年 1 月 25 日在联合新闻中声明了他的看法:

希望“向东看”政策将进一步扩展两国关系(日本和马来西亚),在现有的紧密的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工业和技术培训、学术和技术研究、技术转让。^[2]

他同时指出日本政府:

在这件事上将尽力合作,并承认这一政策的实现对于马来西亚的发展极其重要,这与日本开发马来西亚人力资源的政策也是一致的。^[3]

中曾根康弘向马来西亚承诺:

第一,邀请更多的马来西亚人到日本来接受培训和教育。第二,增加无偿援助,用来在马来亚大学建立日语学校。第三,将巴卡电力工程和沙巴煤气系统工程的有偿贷款增加到 210 亿日元;将直接贷款增加到 500 亿日元,其中包括来自海外经济合作基金的日元贷款和巴生港发电站项目(第二期)的 400 亿日元的项目。^[4]

1983 年 4 月,中曾根康弘在访问马来西亚的前两周召开记者招待会时,进一步强调日本将通过开发人力资源、扩大日元贷款来加强经济合作、提供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作,以支持马来西亚的“向东看”政策。1983 年 5 月 9 日,当马哈蒂尔指出欧洲、美国和马来西亚的一些人批评马来西亚的“向东看”政策时,中曾根康弘强调他很欣赏马哈蒂尔鼓励马来西亚人不但向西方学习,而且秉承亚洲优良传统的

睿智。^[5]

中曾根康弘领导的日本政府也设法积极地配合马来西亚的“向东看”政策。江崎真澄,一位权威的自民党政治家和前通产省大臣,在1982年8月1日访问马来西亚时,向马哈蒂尔承诺“日本将进一步在技术转让、人力资源开发和中小型企业等领域帮助马来西亚”。^[6]他进一步强调“日本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民族。既然马来西亚人要向日本学习,我们就会认真、积极地对待这件事……日本应该在帮助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实现第四个五年计划中承担重要角色。”^[7]

吉隆坡的日本贸易中心数据表明,在过去的三年中日本是马来西亚最大的项目贷款者。1982年,马来西亚得到了35亿马来西亚元的项目贷款,其中有33.5%(12亿马来西亚元)是来自日本的。日本贷款的数量显然要比世界银行(9.71亿马来西亚元)的多。日本的项目贷款在1981年和1982年同样也是最多的,分别为8.45亿马来西亚元和10.3亿马来西亚元。从官方的日元贷款来看,日本提供的九项贷款共2,160亿日元(21.6亿马来西亚元)。^[8]表1.1表明日本对许多马来西亚项目的贷款合作,从1981年以后增长得很迅速,主要集中在电力、通信和铁路等。正如一个日本的外交官所说,日本不会随随便便地将这么大的一笔项目贷款投向马来西亚。^[9]他说日本并不像外面的人想象的那么有钱。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日本受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的影响很大。他似乎很肯定地认为如果马来西亚没有实行“向东看”政策,日本政府不会在经济困境和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还向马来西亚发放这么大的项目贷款。^[10]实际上,早在1982年的10月,当马来西亚要求大项目的贷款时,日本的大藏省就表示他们因为财力困难而不愿意帮助。然而,外务省和通商产业省却倾向于积极地对待这件事,因为他们意识到马来西亚正在实行“倾向于日本的“向东看”政策”。^[11]大藏省的消极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日本这几年的经济发展相对比较缓慢——1981年的财政年度经济发展率为2.7%,是1974年以来最低的,远远低于4.1%的官方政府项目的增长率。^[12]继任的首相铃木善幸表明日本的国家财政收入正处于危机阶段,估计在整个财政年度的收入会降低5—6万亿日元(200—240亿美元)。^[13]即使在这些困难的环境下,日本政府(正如1983年1月

25 日中曾根康弘首相所说)仍然向马来西亚增加了 500 亿日元的直接贷款,因为希望马来西亚“向东看”政策能够成功。^[14]

日本政府和日本在该地区的外交人员似乎要承担一种“道德的责任感”。这一观点在近期特别为一些日本的外交官员所强调。^[15]一种说法是“向东看”政策制造了一种额外的“精神负担”。他们指出马来西亚向日本要求的太多了,如果日本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向日本学习”的运动就会变为“反日运动”,1974 年就出现了这种现象。^[16]

表 1.1 日本向马来西亚的日元年贷款额

FY(财年)	日元贷款项目	数量(10 亿)
1966	1st	18
1972	2nd	36
1974	3rd	36
1978	4th	21
1978	5th	21
1979	6th	21
1981	7th	21
1982	特殊	33.6
1982	8th	21
1983	特殊	40
1983	9th	21

资料来源: Look Japan 29, no. 333 (Tokyo, 10 December 1983), p. 14.

总结日本政府官员和外交人员对“向东看”政策的观点,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日本政府欢迎马来西亚的“向东看”政策,并决定增加各种形式的援助。然而,日本政府的态度却日趋保守,因为他们并没有一套具体的应付政策。^[17]

第二,“向东看”政策是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是为了提高本国的经济水平。马哈蒂尔将“向东看”政策作为一种精神的革命,目的在于将日本的经验引入马来西亚以提高国家的生产效率和敬业精神。一些日本官员觉得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政策,它会给马哈蒂尔的政治生涯带来风险。他不仅遭到国阵

(National Front Party) 的反对, 还受到国内外的批评。^[18]“向东看”政策性的持续也是个问题。

第三, 该政策还存在一些局限。这是因为: (I) 虽然它的目的在于改善敬业精神, 提高工作技能, 但只是有目的地将一些马来西亚人送去日本(如送马来西亚的学生和人员去日本培训);^[19](II) 政府试图在短期内收到很大的成果; (III)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文化、多种语言和多种风俗的多民族国家, 而日本是个单民族国家。

第四, 日本的发展是一个学习和发展西方的技术和经验的过程。这个过程从 1854 年德川幕府在西方的压力下被迫打开国门开始到现在, 持续了近 130 年。无可置疑, 日本一定有一些有利于马来西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贵的经验。然而, 它同样也会有一些不值得马来西亚学习的缺点和弱点。

商 业 界

根据吉隆坡的日本贸易中心的数据, 1983 年 3 月, 日本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共有 720 个项目, 达 17.6 亿马来西亚元。在工业和饭店业的投资达 5.95 亿马来西亚元, 占总量的 20%。1982 年, 日本向马来西亚的出口达 57.5 亿马来西亚元, 而进口达 69 亿马来西亚元。从日本方面来看, 它与马来西亚的出口和进口贸易分别占总贸易的 1.8% 和 2.3%。从马来西亚来看, 它与日本的贸易分别占总贸易的 21.1% 和 24.3%。^[20]从另一方面来看, 1983 年 6 月日本在马来西亚的建筑公司大约有 25 个, 银行有 12 家。由于马来西亚的“向东看”政策, 日本的投资和贸易增长非常迅速, 1983 年 6 月日本在马来西亚总共有 350 家公司。^[21]1983 年 5 月 9 日, 马哈蒂尔向中曾根康弘表示马来西亚设法将一些国有公司(如铁路、广播和通讯公司)转为私有公司, 并将邀请日本企业的加入。马哈蒂尔特别邀请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JICA)对槟城和柔佛(750 公里)之间现代化铁路以及吉隆坡与马来西亚东海岸之间新铁路建设的可行性进行调查分析。^[22]可以理解, 日本在吉隆坡的商人应该很欢迎“向东看”政策, 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在马来西亚就更好做生意了。^[23]然而, 日本同时也表现了他们

对这一政策的顾虑。在与马来西亚的日本商人代表会谈以后，我们可以将他们的观点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商业界对政策的反应要比外交界快。商人在每天的业务活动中可以有机会和许多当地的人员接触。因此，虽然日本政府会为日本的企业提供一些指导，商人才是真正为马来西亚的经济繁荣做出贡献的人。简单地说，日本政府应该避免过分的干涉，允许日本的企业在马来西亚的“向东看”政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二，日本企业不应该以促进马来西亚的“向东看”政策为伪装，进行“剥削”或一度追求“利润最大化”。英国的殖民者因为剥削的政策和行为就受到马来西亚人的强烈批判。马来西亚在二战时与日本有一段很不愉快的历史。因此，日本应该谨慎从事，不要“过热”地实行这项政策。

第三，日本的商业界强调这项政策应该在一段较长的时期保持不变。然而，他们怀疑马来西亚的下一届政府很可能会改变政策。他们感觉到副总理 Datuk Musa Hitam 对这一政策就有不同的看法。人们认为他不像马哈蒂尔那样有热情。据说马哈蒂尔的“向东看”政策受到了政府中那些受英国教育的政治家们的强烈反对。

第四，“向东看”政策将鼓励日本的投资者与马来族合作，共同完成新经济政策。这很可能会改变马来西亚经济现有的所有制结构以及对一些部门的控制权。例如，在建筑业，大的建筑公司几乎全部为马来西亚的华人所控制，但他们会很快地被日本人所代替。因此，我们可以理解马来西亚的华人圈是不会支持这一政策的。^[24]有一个日本的作者指出，一些马来西亚华人后裔的“人才流失”正是他们对这一国家政策不合作态度的表现。^[25]

日本的商人心情复杂地预见日本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和经济扩张将在这一政策的积极执行下得到进一步的促进。他们感到马来西亚政府“对他们很慷慨并予以特殊的照顾”。例如，马来西亚政府将大亚布闵的建设项目交给一个日本的建筑公司。日本公司的出价要比当地公司的出价高 700 亿日元，但是鉴于日本公司建设的时间比较短，并会将现代化的建筑技术引入马来西亚，于是日本公司被选中。^[26]

一些在日本的日本商人，特别是那些对马来西亚没有兴趣的，总

是设法劝阻在马来西亚的同行“不要贪政策的便宜,而违反了在东道国开展业务的原则”。日本在马来西亚的“过度参与”已经为当地的许多组织所批判。这一点也引起了两国之间的许多经济和贸易的摩擦。例如,1983年4月底,即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马来西亚的前两个星期,马来西亚的大众媒介就批判日本在当地的商业和经济行为。马来西亚的商业界批评日本的公司拒绝利用当地的企业给他们做出口代理。自“向东看”政策实行以来,日本的企业在马来西亚签了30多亿马来西亚元的合同,但马来西亚人与日本的承包商所签下的无形贸易几乎为零。所有的船运和保险以及其他的无形贸易几乎都被日本的企业所包揽,剥夺了当地企业的很多机会。^[27]

很显然,当地的组织在中曾根康弘即将来访的时候提出了以上这些问题,并希望两国政府能认真地探讨这些问题并改善当前的状况。^[28]然而,马哈蒂尔却反驳这些对日本企业的批评意见,他说单单批评日本的企业是不对的,因为其他国家的企业也同样不向承包商提供机会。^[29]

马哈蒂尔偏向于日本企业的考虑既让在马来西亚的日本企业兴奋,又让他们担心。他们说“如果我们得到这样的关爱,我们就再也无法说不字了”;“如果我们能使这块饼变得大一些以供更多人分享,那么这个政策才能成功”。^[30]然而其他的一些商人却表示他们“精神压力增大”,并建议用一种“谨慎的方法”来实行“向东看”政策。^[31]

学 术 界

与日本政府和商业界相比,日本学术界对“向东看”政策是最不热情的。这部分是因为“向东看”政策的研究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实际或直接的利益,特别是与商业界相比。因此很少有日本的学者专门研究现代东南亚,而研究马来西亚的就更少了。更重要的是,从实际的方面来看,从这一政策从1981年12月实行以来,这方面课题研究的信息和材料很难得到。

不过,1982年—1983年间,在日本的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至少有以下三个。最早公布的是《国际开发杂志》(Kokusai Kaihatsu

Jyanaru),^[32]第二个是神奈川大学的铃木佑司^[33],第三个是亚洲经济研究所的木村陆男。^[34]以下我们来介绍一下他们的研究。

1. 《国际开发杂志》的观点

(a) 社论编辑者的观点:^[35]社论编辑者坦率地表示马来西亚人要向日本人学习是一种尴尬的情形,并且认为“向东看”政策在日本方面却有“一些出乎预料”。这一政策的目标是:第一,从根本上改变马来西亚人的工作精神,以鼓励他们更积极地参加马来西亚的经济建设;第二,以日本的经济发展为模式,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是新经济政策的延伸。同英国的经济摩擦、国内的经济困境和不利的贸易收支促使马来西亚实施“向东看”政策。然而,日本政府仍没有采取什么具体的政策在这方面与马来西亚合作,特别是在吸收马来西亚政府派遣的学生和培训者方面。

(b) 花田光世的观点:^[36]“向东看”是一个“少向西方学习,多向日本学习”的政策,马来西亚要向日本学习工业技术,教育体制,商业管理和工作作风。这并不能被看做是受新加坡的“向日本学习”运动的产物,因为马来西亚对新加坡实施的这项政策所持的态度很冷淡。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政府被迫引入新经济政策来帮助马来族。马来西亚要吸收日本的管理体系,看起来似乎很难,甚至不可能,尽管在新加坡要相对容易。

(c) 荒木光弥的观点:^[37]“向东看”政策是巩固马哈蒂尔政府的一种“策略”,这一政策产生于马哈蒂尔的《马来西亚的困境》一书中所表明的政策思想。马哈蒂尔设法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以避免马来西亚的经济和政治被外族人(主要是英国人)所控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将日本作为一个参照模式,因为日本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即使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处于停滞的时候也是如此。然而,马来西亚并没有实施任何具体的政策以向日本学习。不过,对于马来西亚的“向东看”政策,日本首先被迫避免在亚洲寻求霸权,因为这一地区的人们仍然记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大东亚经济繁荣圈”的政策;第二,由于发展中国家都希望日本能积极地参与马来西亚的“向东看”政策,日本应当通过为马来西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贡献

献来帮助这个地区建立更多的“稳定和友好关系的国家”。

2. 铃木佑司的观点

“向东看”政策是马来西亚 1970 年实施的新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标是增加马来族在管理层、所有权和就业方面的参与,争取达到占马来西亚经济的 30%。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来西亚要在马哈蒂尔新政府的领导下,力争完成三个任务:第一,为了削弱英国和非马来人对马来西亚经济的控制权(例如,在橡胶和锡矿产的控制),马来西亚就必须和日本加强经济关系。它的理论基础是马来西亚与英国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和不相互依赖的”而与日本的关系是“平等的和相互依赖的”;第二,要改变马来西亚的工业结构,即从以橡胶和锡为中心的原材料生产,转向更加多样化和更大规模的制造业产业,马来西亚必须改善与日本的关系,原因是后者拥有资本、技术和很大的国内市场;第三,向日本学习对马来西亚人来说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日本的经济并不依靠政治的野心和军事的扩张。另外,作为一个拥有许多自然资源的国家,马来西亚可以在受到无理的要求时,拒绝日本。“向东看”政策既是为了实现新经济政策的目标,同时也是为了在 1982 年 3 月期间的总选举中稳定马哈蒂尔政权的策略。日本应该从南北问题这个更广阔的层面来积极地参与这一政策。

3. 木村陆男的观点

木村将这一政策的背景和目标归纳如下:七十年代马来西亚在发展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性的工业政策中获得了成功。在马来半岛,失业率从 1970 年的 8% 下降到 1980 年的 5.6%。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高工资使得很多年轻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到城市。马来西亚在第四个国家计划(1981—1985)中实施了一项新的新经济政策,即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不过为了实现这一点,马来西亚就必须从东方吸收经验和技术。第二,自 1979 年以来,新加坡就开始向日本学习以改善工业结构。很显然,马来西亚的“向东看”政策是受新加坡的“向日本学习”运动的影响而产生的。第三,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马哈蒂尔设法改善马来族的纪律和工作作风,以缩小马来人和其

他民族的经济差距。第四,马哈蒂尔全力设法将“向东看”政策和伊斯兰教的教义结合起来。他说伊斯兰教教导人们要勤奋和求知,这也是“向东看”政策的宗旨。因此实施“向东看”政策将有助于加强伊斯兰教思想,从而孤立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者。

日本的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设法从马来西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对英国在马来西亚利益的态度、令人不满的贸易收支状况、以及经济的持续萧条等方面来解释“向东看”政策。他们对这一政策的实施并不持有乐观的态度。一部分是因为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而马来西亚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向东看”政策只是个相当抽象的概念,日本并没有实施什么计划来支持它。日本是向西方国家学习,而不是向东南亚学习。^[38]日本人很擅长向别人学习,却不擅长于向别人介绍自己的经验。日本没有一套向其他国家传授知识和技术的“社会的设施或政策”。^[39]因此,马来西亚如果想从日本那里得到一些经验,就不得不采取“掠夺”的方式。^[40]不过,马来西亚应该摒弃日本的“糟粕”。^[41]环境污染、住房短缺、封闭的政策、排外的态度以及盲目崇外等等都不应该学习。^[42]一位日本的官员提醒马来西亚说日本的经济发展是伴随着军事扩张而来的(如二战),并且暗示马来西亚不要重蹈覆辙。^[43]

大众传媒

日本有很多常驻东南亚地区的记者。几乎日本所有重要的报纸,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在新加坡都有办事处,那里有很多有经验的驻外记者,他们长期报道马来西亚的新闻。日本的记者只有在要收集数据或者要调查某一事件时才到马来西亚去。《朝日新闻》最近还招聘了一位驻在新加坡专门报道马来西亚新闻的记者。他定期到吉隆坡去考察,向日本的读者报道马来西亚的“向东看”政策以及日本的经济活动。除此以外,在日本很难定期得到有关马来西亚的消息。

日本的大众媒介只是在日本首相出访马来西亚时才会关注这个国家。虽然存在一些关于马来西亚的材料,但它们似乎并没有提供对

这个国家的全面了解。因此希望日本的大众传媒经常报道有关马来西亚“向东看”政策是不现实的。日本的大众对马来西亚的“向东看”政策了解得并不多。最近在东京的一些调查表明日本的学生对马来西亚的“向东看”政策也了解得很少(参见表 1.2 和 1.3)。^[44]多数人要么从没听过这个政策,要么只是听说过,但并不了解。调查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学生说他们从当地的电视和报纸上只能得到该政策的有限信息。不过有 52% 的调查者表示他们知道马来西亚要向日本学习。他们表示马来西亚可以学习日本战后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以及教育制度的高效和高速的现代化过程。大约有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强调这“并不是必须的”,18% 的人表示马来西亚要学习日本“是不可能的”。前者反对日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并表示马来西亚不应该学习日本的发展过程,因为它的社会成本很高。后者强调马来西亚和日本在很多方面是截然不同的,如宗教、文化、工作作风等,因此日本不能作为马来西亚合适的典范。

表 1.2 对马来西亚“向东看”政策的了解层次

	从未听说过的	听说过但不了解细节	在一定程度上了解	被调查者的总数*
Seijo 大学	5(25%)	10(50%)	5(25%)	20(100%)
AA	24(33.3%)	28(38.9%)	20(27.8%)	72(100%)

表 1.3 日本学生对马来西亚人向日本学习的看法

	没必要	值得学习	不可能学习	其他	被调查者的总数*
Seijo 大学	6(30.0%)	9(45.0%)	5(25.0%)	0(0%)	20(100%)
AA	14(19.4%)	43(59.7%)	8(11.1%)	7(9.7%)	72(100%)

注: * (a) 19 到 21 岁的学生;

(b) Seijo 大学中对东南亚或马来西亚没有一个基本了解和兴趣的学生;

(c) AA 学校中对发展中国家有一些了解的学生,其中一些学习东南亚语言。

AA=亚非语言学院。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总的结论,即日本人对该政策只是略微了解,但并不了解细节。他们也许会感觉越来越多的马来西亚的学生

和培训者来日本学习,越来越多的贷款项目投向马来西亚。不过,日本的大众媒体并没有努力地解释为什么日本要培训马来西亚人,为什么要给他们增加贷款,日本为什么会是“向东看”政策中的重要角色。

有一些日本的报纸(如《日本经济新闻》)预见马来西亚的“向东看”政策的实施会有很多困难。他们表示马来西亚的大学、商业界以及普通群众已经过度西化了,因此他们很难有效地学习日本的东西。^[45]另一篇文章清楚地提出“向东看”政策是对欧洲的“反抗”,目的是为了“恢复马来人的力量”,完成新经济政策。该政策的目的是也希望在获得了政治和经济独立之后,寻找一种“精神上的独立”。^[46]从另一方面来看,“向东看”政策也是一种“种族主义政策,它与鼓吹马来人优先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不能得到马来西亚华人的支持和合作。”^[47]日本人警告不要将“向东看”政策当做是“日本化”政策。东京经济进一步表示马来西亚是一个“强硬的伙伴”,它和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存在强烈的务实主义。这些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对日本都存在着怨恨和批判。日本在二战期间的军事占领是反日运动的“潜在主流”。因此应该促进双方的文化交流、增加技术援助、帮助马来西亚解决目前的经济困境、向马来西亚开放日本市场。^[48]

在1983年1月马哈蒂尔出访日本和同年的5月中曾根康弘回访马来西亚期间,对马来西亚的报道也增加了。1983年1月21日至30日期间,《日本经济新闻》,即日本最有名的经济新闻报纸,对马来西亚的报道至少有8条新闻。这些新闻主要报道马来西亚对日本贷款的需要以及日本方面的积极反应。^[49]在1983年5月2日至10日期间,新闻的主要部分报道日本在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以及两国之间的技术合作。^[50]在其他报纸也是这样,特别是在此期间的每日新闻。报道得稍微少一些的有《日经产业新闻》、《重化学工业新报》、《日刊工业新闻》以及《朝日新闻》。《朝日新闻》通过它在新加坡的记者也偶尔报道一些有关“向东看”政策的消息以及日本在马来西亚的经济活动。

1983年5月10日,《日本经济新闻》发布了相对保守的社论“日本如何在亚洲生存”。文章指出中曾根康弘在结束东盟访问的时候,